

# 建構與整合中的原住民族 社會安全網

何子安

## 壹、前言

本文的撰寫靈感來自於前份工作的啟發。當時我的工作內容之一為擔任社政端「強化社會安全網」（註1）在臺東縣的業務窗口，配合該政策督辦臺東縣各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業務，由社工人員依所屬中心位置就近提供服務（註2）。但臺東縣總人口數僅21萬人，其中原住民人口就有7萬多人，主要族別有六族（註3），占全縣人口三分之一（臺東縣原住民族行政處，2023），因此我們業務上經常與「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註4）社工人員碰到，我們為了要如何分工合作開會研習數次，並產出一些文書表件提交原住民族委員會參考。其中一次，與會的社工人員表示，「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人員不若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社工人員清楚自己在社安網的任務，以及受過對應的訓練，並質疑區域社會福利中心已在

執行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下的法定任務（註5），「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與「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工作任務應該要有所不同。

依據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以全體國人為服務對象，在中央由衛生福利部各司署、教育部、勞動部、警政署及法務部矯正署等機關合作推動，在地方則由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含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衛生局（含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教育局（處）（含家庭教育中心及輔導中心）、勞動局（處）、警察局（含少年輔導委員會）及駐地監所（含更生人保護會）合作執行（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19），均未排除原住民；而「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則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12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執行辦理：

配合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秉持以「強化家庭部落（社區）為基石，前端預防更落實」之施政理念，垂直及水平整合跨體系福利服務，發展公私部門協力機制，扶植原住民族在地立案人民團體，積極培育原住民族專業社會工作人才，推動具原住民族文化內涵的家庭社會工作，提早發現需照顧關懷之弱勢原住民族家庭，串連部落互助力量的支持服務，協助其恢復、增強社會力，以提升生活品質，促進家庭成員穩定生活。（原住民族委員會，2022）

林萬億（2023）認為，「社福中心」與「原家中心」同屬社會安全網社會福利服務體系，同樣肩負普及預防、及早介入，及個別密集介入及追蹤脆弱家庭服務的任務，而在保護服務體系中同屬其他體系，協力預防及及早發現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風險事故。但卻也提醒，這只是個分工架構，執行細節還有賴各機構實務操作細緻化。綜此，「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與「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任務初步看起來大致重疊，再加上「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也不會排除進用及培訓具原住民身分的社工人員，若不細究，實難以直接區辨兩中心有何不同。

再進一步查考，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12年度施政計畫內容，除了「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外，其他與社會福利相關的政策還包括了長照資源建置、補助經濟弱勢全民健保費、推動傳統醫療知識復振、法律服務工作、設置文化健康站、推動職業訓練、獎勵取得專業證照、增加僱用獎勵津貼、辦理原住民族長者假牙補助、急難救助、身障生活資材、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團體意外保險及結核病患完治獎金、辦理原住民族青年職場各項職前準備等（原住民族委員會，2023）。依現行我國國家體制，其中大部分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等主管機關亦在規劃執行，種種施政重疊，一如文前所描述「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與「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同時存在且功能類近的現象；少部分諸如推動傳統醫療知識復振及設置文化健康站等項目，則自計畫名稱上可看出發展與原住民文化相關工作方法的企圖。

綜上，我國原住民族的社會安全貌似以「雙層架構」交織，「第一層」由我國各權責機關主政，將原住民個人與其他國人視為同一施政對象，未將其排除；「第二層」由我國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主政，以原住民族為施政對象，提供其他權責機關亦能提供的福利服務，或提供具有原住民族主體性（文化意涵）的福利服務。只是此種「雙層架構」的效用如何？以本文一開始「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與「原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的互動場景為例，在實務工作者的感受中，由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主政的「第二層」施政至少存有與他機關任務重疊及不明確的問題。若欲精確的回應此一問題，恐怕就得有按部就班的政策科學研究歷程。本文受限於篇幅，先從「雙層架構」的歷史脈絡談起，再比較於其他先進民主國家的原住民社會安全政策架構，初步提出一些介入整合的面向，於目前我國行政院戮力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的時刻，期許未來有更多的整合細節能被研究提出，期許我國原住民族的社會安全網能建構及整合得越來越好。

## 貳、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政策的「雙層架構」歷史脈絡

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政策並非一開始就是「雙層架構」的樣貌，甚至連政策主體「原住民族」及政策面向「社會安全」一開始也不存在。

臺灣原住民族與其他民族所組成的國家體制接觸，較為全面始於臺灣清領時期，當時官方以「番」稱呼，立「番」界，於「番」界內平原地區與漢民族接觸較為頻繁及接受漢文化影響者，稱之為「熟番」，居住於「番」界外的原住民稱為「生番」，其所居之地視為「化外之地」，不視為國家領土不予治理管轄。後

期為免國外勢力覬覦，對「番」界外土地改行積極治理，施行「開山撫番」政策，掠取「番地」山林資源，同時對「生番」實施教化同化政策（王慧芬，2000）；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戰敗，臺灣進入日領時期，初期日本政府參採清政府作法，稱原住民為「蕃」，設「蕃」界立鐵絲網通電，阻絕非原住民勢力進入「蕃地」。但殖民授產才是日本政府取得臺灣真正目的，於是後續推動「理蕃」政策，包含開闢各「理蕃」道路、武力鎮壓、實施同化教育及集團移住等，以警察官吏進入「蕃地」施行治理，使原住民不為反抗，取得臺灣自然資源（李文良，2001）。對於居住於「蕃」界內平原地區與本島人（指漢民族與平埔族群）風俗文化迥異之阿美或卑南等族群，則以「平地蕃人」稱之，政策重點為教化同化，設立有「蕃人公學校」（黃唯玲，2012）。後日本因參戰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狀態亟需大量人力物力，於是對臺居民實施「皇民化」政策，目的是希望臺灣居民能效忠日本政府，其中也包含原住民，於是廢除「蕃」人稱謂，改稱臺灣原住民為「高砂族」；1945年中日戰爭日本戰敗，臺灣改由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民政府」或「我國」）接管，接管後初期改「高砂族」為「高山族」，再改稱「山地同胞」，並廢止由警察治理原住民地區的作法，改行地方自治，將原「蕃地」區域設

山地鄉，推行民選鄉長及鄉級民意代表。國民政府接管初期對原住民的政策重點亦為教化同化，故未放棄日領時期曾使用的「平地蕃人」特別行政想法，於是改稱阿美及卑南等族群為「平地山地同胞」，維持施政對象的特別性，至居住於各山地鄉的原住民則稱「山地山地同胞」以茲區別。1947年及1949年因國民政府來臺接收治理因素，先後二次宣布戒嚴，在政治上實施專權高壓統治，但隨著二次世戰後以聯合國為首的去殖民思潮傳播，以及臺灣持續發展的本土及民主化浪潮，1987年宣布解嚴，「原住民」一詞於1994年始修入憲法增修條文，1997年進一步的將具有集體權屬性「原住民族」一詞寫入憲法正式得到我國承認（李明政，2003；黃源協，2014）。

而「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概念一般指政府推行社會福利政策的主要政策議題（key policy issues）（柯木興、林建成，2010）。依據我國現行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其內涵至少包含了社會救助與津貼、社會保險、福利服務、健康與醫療照護、就業安全、居住正義與社區營造等六大項目（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16）。社會福利政策概念上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發展有關，民主國家使用社會福利政策重分配（調節）資本主義產出的經濟成果，穩定國家內部社會秩序。在1960年代以前，我國因國家貧

窮，還在接受美國援助，能提供的社會福利政策實在極為有限。而針對於原住民的施政，國民政府領臺初期尚沿用日治時期的特別行政作法，訂定《台灣省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1950）及《平地山胞生活改進運動辦法》（1956），旨在推行國語、改進衣著、飲食、居住、日常生活和改革風俗，政策精神仍以教化同化為主。1960年代臺灣開始進入經濟起飛階段，臺灣山地亦被吸納入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隨著現代道路開闢完成土地加入經濟農作，人民流動到都會填補工商各業所需勞動力。自此時期起，臺灣原住民社會面臨劇烈的挑戰，流動到都市的居住及適應問題，部落傳統組織及功能瓦解，族群文化及認同流失，心理不健康及酗酒，衍生的家庭暴力、雛妓問題、貧窮問題、貧病交錯，及不諳法律導致的土地或金錢喪失或職業不安全等……問題。而我國原住民社會所產生的新興社會問題，自此時期依循著兩個科層體系進行對策（李明政，2003；黃源協，2014）：

一、1965年行政院公佈「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1972年起推動消滅貧窮運動，1973年起經立法院通過系列社會立法：《兒童福利法》（1973）、《老人福利法》（1980）、《殘障福利法》（1980）、《社會救助法》（1980）等，屬中央政府層級法令，全體國民均為適用對象，其中也包含了「山地同胞」（原住



民），由一般「社會行政」系統輸送福利。

二、1964年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在全省30個山地鄉推動「家事改進班」（與接受美援組織農復會合作），之後臺灣省政府訂頒《臺灣省山胞生活輔導要點》（1980）（由《臺灣省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及《平地山胞生活改進運動辦法》合併）、《照顧遷入都市居住之山胞生活應循之原則及實施要領》（1985）、《臺灣省各縣市山胞生活輔導中心設置要點》（1987）、《臺灣省山胞社會發展方案》（1988）……等以族群別為對象的特別行政措施，法令位階屬地方政府層級，由「山地行政」系統負責執行。

至此，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的「雙層架構」之雛形儼然成形。另一方面，自二次戰後，原受殖民地未能獨立建國的原住民族權益愈受聯合國重視，1982年聯合國成立「原住民族工作小組」，1993年該小組提出《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而我國內，於1987年解嚴前，國內要求民主化聲浪愈高，其中包含了由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自1984年發起的「原住民族正名運動」，1994年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改「山胞」稱「原住民」，1996年成立中央級部會「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並設有社福專責單位社會福利處。2002年配合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再修正，強調民族之集體權利，再更名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2014年配合行政院組織法修正

再更名為「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設有社會福利專責單位不變（黃源協，2014），提供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之「雙層架構」自此確立。

## 參、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政策的效用檢討及契機

我國「雙層架構」的原住民族福利輸送，有學者認為，因原民會主管之政策與法規與全國性社會福利理念區隔不易，加上既有行政體系、經費配置與機構設施不足，並未發生應有的實踐效果（鄭麗珍、李明政，2010；黃源協，2014）。原民會歷年亦自行委託學者進行相關研究（王慧玲，2020），近期受委託研究報告歸納指出我國原住民族社福體系存有下列問題（黃源協，2008），並建議採用「全面性」觀點作為精進對策（黃源協，2014）：

一、政策面：問題為以主流社會價值為主，忽略多元文化觀點；政策規劃缺乏全面性思考，務實性不足。對策為應透各種管道傾聽部落聲音，建立原住民社福統計資料庫，制定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福利政策白皮書，並注意福利提供對非正式支持系統的衝擊。

二、資源面：問題為經費編列缺乏反應多元文化特殊需求，缺乏精確統計數據作為依據；資源錯置或重疊，分散缺乏

整合；資源分配不均，為少數人所掌控。對策為預算編列要能反應多元文化特殊需求，跨部門間應協調整合資源，資源分配應公平公開。

三、執行面：問題為部門間推諉塞責；行政程序繁雜；基層公務人力不足、缺乏熱忱；部落民間組織專業能力不足、人力不足；福利訊息管道不足、不暢通。對策為設置原住民服務單一窗口，加強與教會及部落組織的合作關係，培力原住民人才撰寫與執行專案計畫，並定期追蹤、輔導及評鑑。

揆諸加拿大、美國、紐西蘭、澳洲、日本等其他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目前的原住民族社會安全服務輸送體系，雖與我國形成的歷史脈絡不同，但大體而言呈現「雙層架構」及「特別行政工作融合於一般（社會）行政」兩大類（申育誠，2020；黃源協，2008）。

## 一、雙層架構

### （一）加拿大

1. 一般（社會）行政：加拿大原住民（以下依該國慣用稱謂簡稱「第一民族」）如同其他公民般，可享有社會救助與社會服務。依居住地不同，由聯邦、省、區域、自治市或第一民族政府提供服務。

2. 特別行政：加拿大在1966年成立「印第安暨北方發展事務部」（INAC），

使命為達成聯邦政府對原住民法律上的責任，但也提供福利經費給一般居住於保留區的居民。INAC政策與方案採中央集權，但福利輸送採地方分權，由各部落負責輸送。政策上特別支持健康、永續社區、經濟發展等面向。

### （二）美國

1. 一般（社會）行政：美國原住民與其他公民享有同等權利。由聯邦、州政府提供服務。

2. 特別行政：由聯邦政府內政部印地安事務局（BIA）及衛生暨人群服務部（DHHS）的印地安健康服務組（IHS）提供服務。BIA協調聯邦政府的各單位，並下設部落服務處，於全國有12個區域辦公室，管理326個保留區，負責監督保留區內的直接服務機構。保留區坐落於各州內，行政體系位階相當於州政府，由聯邦（少數位於美國東部州由各州）個別認定是否將行政權力交給部落行使。政策上加強部落社區發展，以社區為介入單位，若部落享有自治權，以部落政府為合作輸送單位。

## 二、特別行政工作融合於一般（社會）行政

### （一）紐西蘭

1. 1966年設立毛利人發展部（TPK），為毛利人政策倡導與諮詢單位，政策焦點

在於教育、健康、就業與所得，由其他政府部門擔任業務執行單位（如社會發展部、衛生部、婦女事務部及內政部等）。

2. 整合各層級組織，由中央政府規劃福利服務法案，由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商業組織共同執行。

## （二）澳洲

1. 1972年設立原住民事務部（DAA），負責制定政策及協調政府各相關單位分工。政策目標為全面性政府，2006年地方政府依其郡內人口數設立原住民局（DAA），於地方設置原住民服務中心。

2. 2004年組成全國原住民議會與原住民政策協調處（OIPC），並設立原住民協調中心（ICCs）。為服膺全面性政府目標，同年家庭社區服務部擴編為家庭社區服務與原住民事務部（FaCSIA），業務範圍包含原住民及其他社會福利服務。2006年OIPC整併於FaCSIA。

## （三）日本

1. 日本2008年將愛奴民族認定為原住民族，2019年通過《推動為實現愛奴人的驕傲所尊重的社會的施行策略相關法律》，首次將愛奴民族正式定位為「原住民族」。現行的愛奴政策體系主要由振興愛奴文化的文化政策及福利政策所構成。在內閣設置以跨部會方式所組成，由文部

科學大臣等相關官員組成「愛奴政策推動本部」，推動社福、地區經濟振興及國際交流措施。

2. 在中央政府的層級部分，強調跨部會合作；在地方（北海道）政府部分，強調和民間團體及各個大學合作。北海道政府每七年進行一次的生活實態調查，北海道政府根據2013年調查結果遂於2015年提出以「充實教育支援體制」、「安定僱用」、「振興產業」、「安定生活」及「強化組織間的合作」為基本方針。

上述紐西蘭、澳洲及日本等國將「特別行政工作融合於一般（社會）行政」的經驗，雖各國作法不盡相同，但其理念均與「全面性」觀點相近，可供未來我國作為參考；強調應透過協調或整合，促使其其他非原住民行政的部門共同投入對原住民族的社會安全服務，發揮政策加乘的效果。簡言之，「原住民族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各部會、各級政府、各公私部門間應加強共同合作推動原住民族社會安全事宜。其實原民會在自行委託政策效益研究後，亦廣續根據結論訂定《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發展計畫》（王慧玲，2020），至今亦已執行至第4期（2021～2024年）（原住民族委員會，2023）。但筆者於實務現場，仍見有關原住民族行政與一般（社會）行政間的協調整合機制仍尚未成熟，適逢目前我國行政院以院級機關的高度，於各縣市加強推動「強化社會安全

網」計畫，已歷時五年進入第二期，各部門、各級政府之間及各公私部門間之整合與協調，已有一些實踐機制及經驗，而原民會下轄之「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亦於2023年被行政院指定加入（林萬億，2023），爰本研究認為「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其實亦可視為我國原住民社會安全政策從「雙層架構」邁向「全面性」的契機。

#### 肆、應包含文化及自然資源權利之「全面性」觀點的原住民族社會安全政策：代結語

經綜整上述我國族群關係歷史脈絡，及紐西蘭、澳洲及日本等國將「特別行政工作融合於一般（社會）行政」的政策內容，及目前國際原住民族社會安全政策相關的學理（黃源協，2014），筆者運用彼得·克諾普菲爾等人（2021）（註6）提出的「政策行動者之間的基本三角模型」提出我國「全面性」觀點的原住民族社會安全政策的基本架構（如圖1），說明如下：

一、行政院自2018年起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迄今已歷時五年進入第二期，原住民族部門始被指定加入。

二、鑒於過往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雙層架構」體制成效不顯著，參採紐、澳、日等國經驗及我國原民會委託研究結

論，改採「全面性」觀點，參採國際反社會排除、多元文化、充權及優勢觀點等學理提出一般國民及原住民族應均為政策介入對象。

三、所有（含原住民及其他非原住民行政部門），應透過協調或整合，運用政策使一般國民支持多元文化觀點，改變壓迫及社會排除的社會結構；另一方使用充權及優勢觀點，培力原住民族建構自身能力。

四、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議題源自於「同化」及失去自然資源權利的族群關係歷史脈絡，注重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利（主體性），重視原住民族文化維繫與自然資源利用的相關性，拉近一般國民與原住民族之間的生活水準差距，族群關係和諧與社會安定，是為解決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問題的政治定義。

再按我國現行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16）六大項目——社會救助與津貼、社會保險、福利服務、健康與醫療照護、就業安全、居住正義與社區營造，掌握上述「全面性」觀點的原住民族社會安全政策的基本架構，主要核心制訂和實施政策的政治行政機關至少應包含社會、衛生、勞動、住宅、自然資源利用及文化事項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臺東地區為例，此些治權機關（單位）包含了：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臺東縣政府社會處、臺東



縣衛生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臺東就業中心、臺東縣政府建設處、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分署、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東分署、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等。

至於此些治權機關（單位）應如何分工合作，筆者認為可借鏡近年來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的實踐經驗，由行政院再邀集中央各相關治權機關參採國際反社會排除、多元文化、充權及優勢觀點等學理，研商增訂原住民專章，另訂管考指標。至於政策實踐情形之掌握，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年）》已有明確管考機制可供參考（衛生福利部，2021）：

一、行政院為輔導及管考中央政府跨部會間及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合作執行計畫成效，敦請專家學者辦理輔導訪視，並於各縣市辦理巡迴輔導，瞭解跨體系待解決及待加強問題，再提出建議報請行政院協調妥處，發展在地化工作模式。

二、訂定計畫執行績效指標，每半年統計及公布計畫執行情形，並於每年年底進行績效考核，其中即包含跨網絡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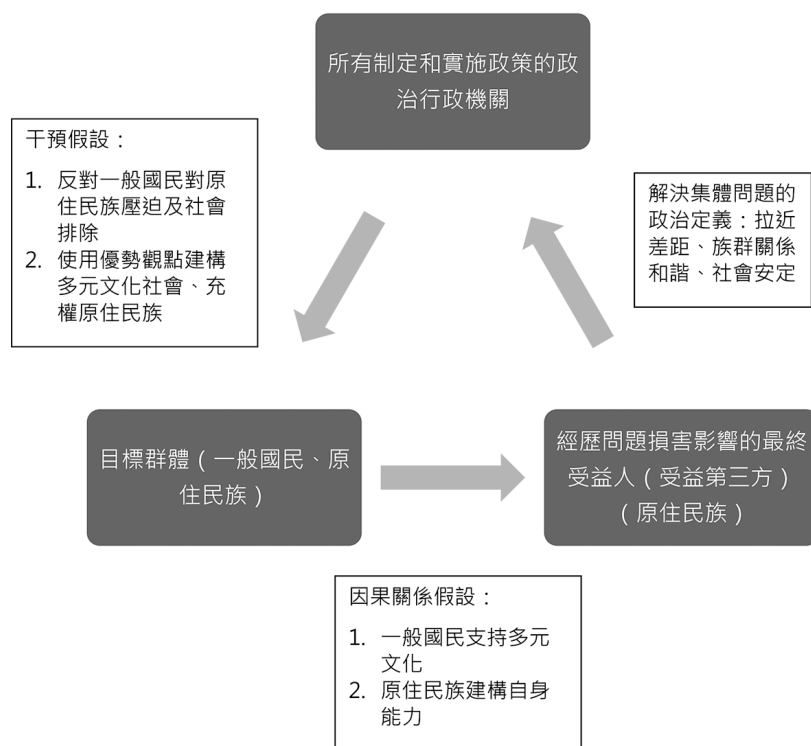


圖 1 我國「全面性」觀點的原住民族社會安全政策的基本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彼得·克諾普菲爾（2011／2021）。

績效，規定各單位應定期辦理區域聯繫會議、跨體系聯繫會報及網絡單位聯繫會議等，並依據考核成績獎勵表揚績優者及調整機關受該計畫補助經費比率。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運作迄今已歷時五年，我國原住民行政部門甫受指定加入運作之初，實值得關注。我國原住民族有其文化及自然資源權利失去之獨特歷史脈絡及其集體權利主張，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網之建構，需改從「全面性」的

政策觀點開始，方能發揮機關一體及政策加乘的效果。然而更重要的是，族群關係和諧及社會的改變，還有賴全體國人的共同參與。

（本文作者為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學組長）

**關鍵詞：**社會安全網、社會安全、社會政策、多機構合作、原住民族

## 註 釋

- 註1 「社會安全網」政策係我國行政院2018年核定，該政策目標主要為回應我國家庭功能式微，社會上時而發生的隨機殺人、兒童及少年虐待、藥酒毒癮、暴力等事件，期以整合國家科層體制功能，發揮預警機制，提升支持家庭及個人的功能，及時遏止憾事發生（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19）。
- 註2 臺東縣因地理位置狹長，且縣內有海岸山脈切割，爰臺東縣政府社會處依主要交通動線、人口分布情形及中心間距，分設四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並將縣內16個鄉鎮人口均納入服務範圍。分為海岸線區社會福利中心（設於成功鎮，服務區域還包含長濱鄉及東河鄉）、縱谷線區社會福利中心（設於關山鎮，服務區域還包含池上鄉、海端鄉、延平鄉及鹿野鄉）、臺東市區社會福利中心（設於臺東市，服務區域還包含卑南鄉）及南迴線區社會福利中心（設於大武鄉，服務區域還包含太麻里鄉、金峰鄉及達仁鄉）。至於縣內兩個離島鄉（蘭嶼及綠島），則分設工作站，併入臺東市區社會福利中心進行工作督導。
- 註3 主要族群別為阿美、卑南、布農、排灣、魯凱、雅美（達悟）等六族。
- 註4 依據中央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規劃，原住民族地區原則每一鄉（鎮、市、區）中央政府得補助補助民間團體設置一個「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再由地方政府為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2023a）。臺東縣因縣內16鄉鎮僅綠島鄉為非原住民族地區，又縣內15個原住民鄉鎮市均有民間團體願意承做，故臺東縣內「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共有15處。

- 註5 「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中賦予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任務為服務「脆弱家庭」。「脆弱家庭」係指：「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衛生福利部，2019）。
- 註6 Knoepfel為瑞士洛桑大學與瑞士公共行政學院榮譽教授，Larrue為法國東巴黎大學教授，Varone為瑞士日內瓦大學教授，Hill為英國新堡大學榮譽教授，合著出版《公共政策分析》（*Public Policy Analysis*）一書，說明政策分析學科中有多種學派及理論模型，略以：一、分析政策如何形成，包含了多元論（含公共選擇學派）、批判論（含新馬克思主義、新管理主義）、制度論（含新統合主義、新制度主義）；二、解釋公共行為如何運行，如管理理論、有限理性、漸進主義及系統分析等；三、評估政策的結果和社會影響，著重於提出評估方法、評估流程。經Knoepfel等人多年實證研究，綜整政策分析學科各學派看法提出理論模型，於近年來於多國被廣泛應用（含加拿大、法國、西班牙、德國、瑞士、烏克蘭、英國、墨西哥及秘魯等）。

## 參考文獻

- 王慧芬（2000）。《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p89y7c>
- 申育誠（2020）。〈淺談日本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政策之制定與實施〉。《社區發展季刊》，169，308-323。
-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19年12月6日）。〈重要政策——強化社會安全網絡〉。檢索自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6e7e91d8-483d-4b88-8501-7f787092e002>
- 李文良（2001）。《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d74eqr>
- 李明政（2003）。《文化福利權》。松慧。
- 林萬億（2023）。〈社會安全網的跨體系多機構分級分工架構〉。《社區發展季刊》，181，31-65。
- 柯木興、林建成（2010）。〈研析「全民社會安全」政策目標〉。《社區發展季刊》，129，456-465。
- 原住民族委員會（2022年11月17日）。《112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53BBAA032279EAC0/>

D27A985131FA61B7F6BA256524B47291-info.html

原住民族委員會（2023年2月7日）。《原住民族委員會112年度施政計畫（核定版）》。<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7FC80B1DD4923DDF/7AADFDAD93E0BBD36F51CB2375B3D43B-info.html>

彼得·克諾普菲爾（Knoepfel, P.）、柯琳·拉魯（Larrue, C.）、弗雷德·里克瓦隆（Varone, F.）、麥可·希爾（Hill, M.）（2021）。《公共政策分析》（曾健准譯）。巨流。（原著出版年：2011）

黃唯玲（2012）。〈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臺灣史研究》，19（2），99-150。

黃源協（2008）。《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之規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黃源協（2014）。《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問題分析與體系建構》。雙葉。

臺東縣原住民族行政處（2023年2月8日）。〈族群分類與分佈〉。<https://aborigine.taitung.gov.tw/cp.aspx?n=14405>

衛生福利部（2019年11月4日）。〈什麼是脆弱家庭？要如何辨識脆弱家庭？〉。檢索自社會安全網，<https://topics.mohw.gov.tw/SS/cp-4531-50117-204.html>

衛生福利部（2021）。《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 年）》。<https://www.mohw.gov.tw/dl-71048-082a6fbf-b202-4c4d-a82a-5ff78f39d4e9.html>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16年4月21日）。《社會福利政策綱領》。<https://dep.mohw.gov.tw/DOSAASW/cp-535-3227-103.html>

鄭麗珍、李明政（2010）。〈台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與健康政策評估〉。載於黃樹民、章英華（主編），《臺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頁181-258）。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